

学科发展

[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编者按】2023年5月,《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指导性目录(2023年)》和《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简介(2023年)》正式发布。全球治理位列公共管理学新增的六个二级学科行列。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不仅要强调在讲好中国故事中与国际对话,还需要从中国之治的经验出发为全球公共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公共管理不能只回答中国之问,不回答世界之问”(杨开峰等,2023)。本期“学科发展”特邀全球治理二级学科工作组联合召集人、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领衔撰写专稿,讨论作为中国方案的“四大全球倡议”对于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路径。

四大全球倡议： 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中国方案*

郁建兴 邱 毅 周 俊**

【摘 要】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品,而且为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回应全球公共品供给困境的过程中,四大全球倡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构建了“价值倡导—议题设置—经验共享—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框架,从理念、目标、内容和路径四个方面,积极推动全球公共品供给从“霸权模式”与“竞争模式”向“共生模式”转型。为更好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变革中的引领作用,应持续面向未来进行增量改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倡

*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研究”(项目批准号:25@ZH002)的资助。本文基于郁建兴教授2025年9月26—27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全球治理五十人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改写而成。

**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邱毅,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周俊(通信作者),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授, china.zhoujun@139.com。

引文格式:郁建兴,邱毅,周俊. 2026. 四大全球倡议: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中国方案[J]. 公共管理评论, 8(2): 24-42.

Cite this article: Yu J X, Qiu Y, Zhou J. 2026.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China's solution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model[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2): 24-42. (in Chinese)

议落地生根以及重视新技术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公共品;共生模式;中国方案

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绕过联合国袭击伊朗,再次暴露了国际社会霸权主义的猖獗和全球治理赤字。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核心任务,亦是实现“全球之治”的关键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融入全球到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转变,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中的角色也呈动态演进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以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亚非拉国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开始参与多边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参与多边机构,持续推动南南合作,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治理观(张翠萍和吕永红,2026)。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四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立足自身发展经验和战略能力,从物质基础、安全保障、文明互鉴和制度安排四个维度提出的,旨在引领世界秩序朝着符合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利益方向发展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全球公共品供给的“负责任参与者”转型为“系统塑造者”,开始发挥主动引领作用。不仅如此,四大全球倡议更是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中国方案,它以适应时代之需、世界之需的逻辑,对既有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了全方位重构,对于破解全球公共品困境、实现“全球之治”具有重大意义。

一、全球公共品供给困境与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

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使得维护和平、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及构建国际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成为现实需要,全球公共品也因此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所谓全球公共品,是指收益可覆盖所有国家、人民和各世代物品(Kaul et al., 1999)。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中的公共品理论,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被认为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不二选择,全球公共品因此被视作全球化的必需品,而全球治理的完善,本质上也要求全球公共品的供给结构与供给能力能够更加契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与发展诉求。如果将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化的起点,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已有数百年历史。有研究将20世纪40—50年代之前视作全球公共品体系的孕育期,之后则为稳固和繁盛期(徐秀丽和李小云,2022)。在孕育期,为争取和平、避免战争及发展对外贸易,现代民族国家纷纷订立合约,英国则在

推动建立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等行动中确立了自身的霸主地位。20 世纪 40—50 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纷纷成立,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全球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动全球进入发展“黄金期”。但是,这一时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具有鲜明的霸权主导特征,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华盛顿共识”等构建了一套高度嵌入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际秩序的走向。

进入 21 世纪,全球公共品供给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涵盖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社会力量的多层次主体体系。2000 年 9 月,189 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千年发展目标”;2015 年 9 月,联合国提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取代了“千年发展目标”。上述目标不断凝聚全球共识,促使全球公共品体系逐渐形成^①。近年来,全球公共利益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严峻,推动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声称要将本国从现有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的国家。在许多西方社会,支持破坏而非改革的政治力量日益获得动力。世界已进入一个“推土机式政治”时代(Bunde and Eisentraut, 2026)。与此同时,联合国及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试图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逐渐加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使其摆脱霸权国家的干扰;彼此之间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机构大量涌现,各自的作用不断扩大,比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SCO)等都在提供全球公共品;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影响全球公共品供给格局(蔡昉,2017)。然而,这些变革未能带来稳定的国际秩序,许多国家的民众并未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反而面临更多无序和不确定性。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美以联合袭击伊朗等的爆发,使得全球安全、文明冲突、治理低效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从全球公共品供给来看,当前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全球公共品责任失衡。在全球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成本、义务与负担未能公平合理地在各国、各群体之间分摊,导致结构性不公。具体而言,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联合国机制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规则制定权长期集中在少数强国手中,全球议程设置主要反映北方国家利益偏好,尽管全球主权国家数量已超过 190 个,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重大议题上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依旧不足(郭锐和马银,2025)。1992 年的《里约宣言》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其缺乏量化标准和法律约束力,导致“责任平摊化”,即责任从高排放、高消费群体转嫁至弱势国家和普通民众。

其次,全球公共品供给不均衡。不同区域和国家在全球公共品获取机会、质量水平、覆盖范围和受益程度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南北差距。比如非洲的医生数量仅占全球的 3%,却承担着 24%的疾病负担;中东冲突地区的基本医疗、教育等公共品几近崩溃;全球 90% 的未联网人口集中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全球

① 光明网:《全球公共品面临四大赤字挑战》,2022 年 6 月 30 日, https://www.gmw.cn/xueshu/2022-06/30/content_35851266.htm, 2026 年 3 月 13 日访问。

公共品供给不均衡表面上看是“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实质上是“由谁定义和供给公共品”的问题,是殖民遗产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下的秩序不公问题的显性化体现。

再次,全球公共品供需失衡。在需求侧,全球化和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对全球公共品的新需求。一方面,大流行病、金融动荡、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具有高度外溢性,但缺乏有效的全球协同应对机制;同时,人工智能、海洋污染、太空治理等新兴领域不断涌现,但共同治理规则却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升级,全球南方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85%,不仅需要绿色技术、数字接入,还需要公平贸易规则以及和平安全。与此同时,公众的全球治理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对安全、环境、健康、数字权利等议题的关注度持续提高,要求政府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然而,在供给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达国家在公共品供给中的主导地位下降,传统供给体系面临供给能力和意愿下降的双重挑战。例如,2020 年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于同年 7 月正式停止对该组织的资助,显著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全球健康危机的能力。而发展中国家虽有强烈需求,但缺乏财政、技术和制度支撑,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中尚难以发挥作用。

最后,全球公共品创新不足。全球公共品供给结构和内容仍局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国际格局和国际需求,严重滞后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发展变化,过度依赖国家与传统多边机制,忽视地方政府、城市网络(如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非政府组织、原住民社区、合作社等主体的作用,各国对数字基础设施、绿色技术的新需求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七国集团(G7)、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奥库斯(AUKUS)等小多边机制绕过联合国开展行动;多个重叠平台关注相同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气候治理领域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绿色气候基金(GCF)和创新使命(Mission Innovation)等平台,这导致全球公共品供给碎片化与竞争性机制泛滥,各组织的协调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全球公共品供给困境是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赤字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发展方面,如期实现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尚有 8 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数十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服务;全球粮食不安全人口超 23 亿;数字鸿沟、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United Nations, 2025)。在安全方面,全球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增加,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全球冲突数量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新高(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2024)。2022 年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民众安全感降至历史低位(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2)。在文明方面,不同文明的认同差异与利益博弈交织引发的文明冲突呈上升趋势。部分国家鼓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将文化差异政治化,加剧文明对抗。在治理方面,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不足,存在“南弱北强”的结构性失衡,治理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霸权国在自身利益受损时还单方面“退群毁约”,使多边合作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在全球治理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治理倡议(见表 1)。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推动全球共同发展,落实联

联合国 2030 年目标,包含八大核心理念与原则:“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人掉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驱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行动导向,协同增效。”^①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理念和原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②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③全球治理倡议阐明“五大坚持”的核心理念:“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④四大全球倡议创造性地提出了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体系的中国方案,深刻回答了如何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表 1 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名称	提出时间	提出场合	提出背景	核心理念、原则和内涵	倡议目标
全球发展倡议	2021 年 9 月 21 日	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南北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	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人掉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驱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行动导向;协同增效。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实现联合国 2030 年目标
全球安全倡议	2022 年 4 月 21 日	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	地区冲突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立足联合国宪章,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球发展倡议概念文件》,2021 年 9 月 21 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qqfzcy/zywj/202305/P020230511542211508241.pdf, 2025 年 11 月 7 日访问。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2023 年 2 月 21 日, 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11179_674909/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2025 年 11 月 7 日访问。

③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 年 3 月 15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950.htm, 2025 年 11 月 7 日访问。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2025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509/t20250901_11699909.shtml, 2025 年 11 月 7 日访问。

续表					
名称	提出时间	提出场合	提出背景	核心理念、原则和内涵	倡议目标
全球文明倡议	2023 年 3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文明优越论与“普世”论调,加剧意识形态对抗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致力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治理倡议	2025 年 9 月 1 日	“上海合作组织+”会议	多边体系受冲击,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	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	指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方向、原则和路径

二、四大全球倡议的全球公共品属性与逻辑框架

四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全球公共品。依据公共品理论,纯粹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私人部门供给此类产品易产生“搭便车”“公地悲剧”等困境,因此政府通常是公共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在全球层面,并不存在统一的“政府”,因此,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曾高度依赖霸主国家,但霸主国供给全球公共品时通常夹带自身国家私利,无法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正义性。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向来以不称霸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以“不称霸”为基本立场,其全球公共品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主体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四大全球倡议打破发展主体的身份壁垒,面向所有国家,“欢迎各国共同参与”,不设政治和意识形态门槛,不搞“小圈子”或“俱乐部”,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践行“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的开放包容原则。

其二,内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提供多元合作选项与灵活参与路径,尊重各国依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优先次序及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作模式的权利;平等关切重要国际性问题,反对将某些国家的发展、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发展、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主张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支持各种文明形态在全球话语体系中获得平等表达权。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成果共享,倡导普惠发展理念,特别关注全球南方,将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作为优先合作对象,主张向这些国家无偿转让知识、技术。

其三,机制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四大全球倡议契合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核心全球公共品的多边主义内核,展示的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参与姿态,而非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替代。不仅如此,四大全球倡议还通过创立和建设新的多元合作平台,推动不同区域平台协同发挥作用,同时欢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项目实施,对既有机制形成有益补充。

此外,四大全球倡议还具有复合公共品的特征,它同时兼具理念型、制度型、器物型、赋能型公共品的多重属性。理念属性体现在四大全球倡议的“倡议”性,它通过倡导新观念、新价值、新文化影响全球治理理念,探索建构新的国际秩序。制度属性体现在四大全球倡议通过供给一系列制度推动国际秩序重构,比如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供新型多边金融治理规则的全球议程设置权与执行机制。器物属性体现在四大全球倡议提供大量基础设施类、物资类全球公共品,比如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22 亿剂新冠疫苗。赋能属性体现在四大全球倡议通过知识转移、技能培训、技术共享等方式,提升其他国家发展能力,比如在亚非欧 20 余国设立职业教育中心,教授智能制造、新能源、轨道交通等技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建立“中国-加勒比减贫中心”。

四大全球倡议以自身独特的逻辑框架发挥供给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在需求侧,它注重通过核心价值倡导凝聚全球共识;在实施过程中,注重通过关键议题设置筑牢国际合作根基,通过发展经验共享探索可行路径;在供给侧,注重通过行动能力建设夯实落地基础。通过供需匹配与过程保障,四大全球倡议形成了“价值倡导—议题设置—经验共享—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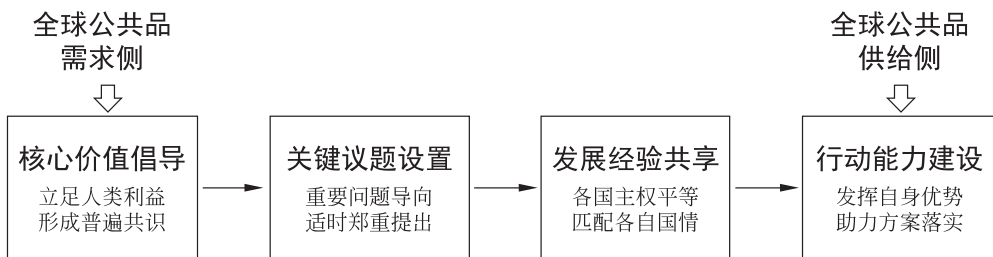


图 1 四大全球倡议的逻辑框架

首先,核心价值倡导。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价值主张应为符合大多数国家基本利益的国际共识,是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丑则静,2026)。因此,主导国际秩序建构和变迁的国家必须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理念(唐世平,2019),进而提出可信任、被接纳的全球治理方案。不同于西方国家一味强调思想、言论和选择自由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张泽宇和何玲玲,2026),四大全球倡议秉承“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智慧,立足于全人类的长期共同利益,推动各国就完善全球治理达成原则性共识。

四大全球倡议的核心价值主张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其一,“坚持发展优先”和

“坚持普惠包容”,将发展权视为“不可剥夺的人权”,聚焦全球发展鸿沟扩大、极端贫困反弹等现实问题,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普惠包容的新阶段,其价值导向直指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其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将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化和双重标准,聚焦全球武装冲突加剧、流离失所人口递增等安全困境,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利益。其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对立与阵营割裂,聚焦文明互动中的认知偏差与隔阂,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契合全人类的共同文明利益。其四,“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反对个别大国垄断治理权、动辄“退群毁约”的霸道行径,聚焦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不足问题,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架构,维护全人类的共同治理利益。四大全球倡议以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为核心,构建了极具包容性的价值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遵循。

其次,关键议题设置。全球治理中的关键议题设置是指一国选择特定议题进入国际制度议事议程的行为,议题设置背后隐藏着主导国家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王明国,2024)。四大全球倡议的议题既体现了重大问题导向的实践理性,更蕴含着包容差异的治理智慧,通过聚焦当下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且紧迫问题,明确国际合作的焦点任务,指明了全球治理的四个方面具体目标。一是全球发展失衡问题。针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受阻的现状,将消除贫困、保障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技术创新等作为核心议题。二是全球安全危机加剧问题。将维护传统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等作为核心议题。三是全球文明交流隔阂问题。将文明多样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传承创新等作为核心议题。四是全球治理体系失效问题。针对个别大国侵蚀国际治理规则、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等现实问题,将完善全球治理架构、推动多边机制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权与话语权等作为核心议题。

这四方面重大议题具有内在关联性,发展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筑牢物质根基,安全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营造稳定有序的国际环境,文明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深厚的精神内核和情感、道义动力,治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和协商机制。四大全球倡议的议题设置不仅具有重要性、紧迫性,而且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展现了全球视野与战略高度。因此,四大倡议一经提出便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

再次,发展经验共享。传统全球治理往往强调“单一标准”“统一模式”,忽视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导致不少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方案在实践中难以落地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事实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差异。四大全球倡议主张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尊重各国基于具体国情的发展模式、制度和路径选择权,共享内容既包括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也涵盖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发展实践,其核心要义在于维护主权平等、尊重国家差异,构建开放包容的发展路径。发展经验共享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拓宽了视野、指明了路径,彰显了中国供给全球公共品

的务实性与灵活性。中国自身在践行这一主张的过程中,通过搭建经验交流平台,推动各国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实现优势互补,为各国实现倡议目标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中国通过分享减贫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减贫能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国家分享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经验,帮助相关国家提升发展能力。这些经验共享行动既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权,又为各国实现倡议目标提供多元化的路径参考,体现出“授人以渔”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最后,行动能力建设。行动能力是四大全球倡议落地见效的必要条件,各国在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参与提供全球公共品时,应当能够将倡议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可评估、可复制的实际行动。能力建设是确保价值理念从“纸面”走向“地面”的核心支撑。具体来说,行动能力建设是指通过制度、机制、资源、人才、技术等多重赋能,提高倡议相关方参与制定和协同落实倡议的能力。中国在提出四大全球倡议的同时,注重将倡导转化为实际行动,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全球公共品供给能力提升。例如,在机制建设能力方面,2022 年,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牵头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联合 19 个国家共同发起设立“国际调解院”;2024 年,在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将每年 6 月 10 日确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在资源动员能力方面,2015 年,中国政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2022 年更名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截至 2026 年 4 月,该基金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 20 多个国际组织在 70 多个国家实施了 200 多个项目,惠及 4000 多万人^①。在本地化执行能力方面,中国尊重各国国情,倡议“本土化落地”,比如全球安全倡议在东南亚推广“澜湄非传统安全合作”,联合打击跨境犯罪、毒品、电信诈骗等,由六国共同制定行动计划。此外,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数字丝绸之路”等系统性提升共建国家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的能力。总之,四大全球倡议强调各国根据自身优势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在全球治理中做贡献,以实现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并以实际行动加强相关主体的能力建设。

三、四大全球倡议对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重构

最早将公共品概念引入国际治理研究的学者金德尔伯格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需要某个国家(主要是霸权国家)承担“公共成本”。由于公共品的特殊属性,多数国家不愿或无力为全球公共品支付成本,只有霸权国家具备意愿和能力,所以霸权国是全球化以来全球公共品供给的主导者。但是,霸权国往往将自身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作为提供全球公共品的附加条件(张春,2014),进而形成了“中心-半中心-边缘”型世界体系,作为体系中心的霸权国,通过技术垄断、市场规则

^①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举行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三届高级别会议中外媒体吹风会暨例行记者会》,2026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cidca.gov.cn/20260415/ca4d5ea208684adc8de583f8462d1781/c.html>, 2026 年 4 月 19 日访问。

制定权及政治军事霸权,构建起“中心剥削半中心、中心与半中心共同剥削边缘”的秩序体系(沃勒斯坦,2013)。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向以各自为首的国际体系提供公共品,发挥了国际关系“稳定器”的作用(樊勇明,2010)。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建立和维持各种国际制度约束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以制度模式建立了以自身霸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伊肯伯里,2008)。近年来,随着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走向孤立主义,霸权日渐衰落的美国失去了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而其他国家出于自利需求和理性计算,或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或选择“搭便车”(程永林和黄亮雄,2018),使全球权力呈现去中心化、分散化特征,缺乏稳定性,面临失序风险,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可能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石静霞,2021)。与此相伴随,全球公共品的竞争性供给模式逐渐形成,具体体现为权力分布日益“多极多元”(周桂银,2024),领导国、参与国、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影响并塑造国际制度,以实现各自的权力、利益或价值诉求(李巍和罗仪馥,2019)。

全球公共品供给的霸权模式和竞争模式,在供给理念、目的、内容、方式和结果上存在显著不同。在霸权模式中,霸主国供给全球公共品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本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公共品的内容以价值型、制度型公共品为主,器物型公共品为辅;供给方式以自上而下为主,决策主要由霸主国或少数发达国家主导,输出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and 政策未必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霸主国甚至在竞争力下降时“毁约退群”,造成部分全球公共品“断供”的极端现象。在竞争模式中,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目标存在差异,既有提升全球影响力的追求,也有解决全球问题的考量,其中不乏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价值主张;公共品内容丰富多样,供给主体往往依据自身资源优势发挥作用;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兼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特征,部分反映强国意志,部分体现大多数国家的真实需求。

竞争模式是对霸权模式的超越,能够激发各类主体的参与意愿和创新精神,提高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与响应速度,增加受援方的选择权,以及推动标准升级和规则演进。但在多极化格局中,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会围绕公共品供应权展开竞争(Kaul et al., 2003),出现供给碎片化、协调失灵、加剧不平等等问题,甚至可能造成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难以持续等不确定性和风险(曹德军,2019)。

四大全球倡议产生于全球公共品供给的霸权模式尚存、竞争模式初现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对两种模式的反思和回应,体现了中国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努力。通过理念、目标、主体、内容和路径重构,四大全球倡议积极推动形成一种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共生”模式。该模式具有以下五方面特征。

第一,理念重构:实现全人类长远利益。在全球公共品供给的霸权模式中,人类社会被割裂为不同群体,霸权国及其盟友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世界立法,将国际合作视为谋利工具,看重短期收益,罔顾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竞争模式在对区域和国

家利益的追求中稀释了人类共同价值,存在使人类社会碎片化的风险。中国旨在突破霸权和竞争模式,着眼于人类长远发展和全人类福祉,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深邃思考当下世界发展难题的基础上,将实现人类共同的长远利益作为参与全球治理、供给全球公共品的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四大全球倡议中。首先,四大全球倡议具有普遍性,不因种族、信仰、发展阶段等差异而将任何国家排斥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之外,强调所有人类社会成员都平等享有发展、和平、参与等权利,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受损,全人类都将承担后果。其次,四大全球倡议具有长远性,关注地球生态承载力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强调文明多样性、代际公平、生态环境保护 and 公共卫生利益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内容。最后,四大全球倡议具有合作性,推动实现国际社会集体利益最大化,反对一国因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共同利益,坚守合作才能共赢的理念。

第二,目标重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人类长远利益最终要落实为实践路径。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14)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提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加以回答(习近平,2017)。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机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蕴含着美美与共、非排他性、非意识形态化的全球伦理,是实现全人类长远利益的重要指引,为四大全球倡议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和平和安全为根本前提,倡导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和对抗,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四大全球倡议系统性地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框架,确立了“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基本行动路径。作为理念型全球公共品,四大全球倡议通过明确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目标体系,重塑了全球治理的方位坐标。

第三,主体重构:多主体协同发挥作用。在从霸权模式转向竞争模式的过程中,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不再是单一霸权国家或少数强国。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全球南方、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凸显。但这种多主体供给全球公共品的格局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不容小觑。相较而言,四大全球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并赋予其社会建构属性。公共品的社会建构性观点突破了传统学界对公共品的静态定义,聚焦公共品的内容及其供给方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互动、权力博弈与意义协商的动态建构过程。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引下,四大全球倡议坚持开放性原则,构建起面向各类国家的参与机制,明确“面向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反对在主体资格上划分等级和阵营”的原则,保障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制度模式国家的平等参与权。具体而言,“共商”维度呼应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导向,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议题讨论与议程设置中均享有平等话语权,打破了传统全球治理

中少数国家主导的话语权垄断格局;“共建”维度强调全球治理的协同性建构逻辑,倡导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与国际组织体系的建设需由世界各国协同推进,国际规则制定权应回归各国,由人民共同执掌,从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主体结构;“共享”维度锚定全球治理的普惠性价值目标,追求治理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推动构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积极破解全球治理成果分配失衡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四大全球倡议在共商共建共享框架下进一步融入“共治”理念,确立各国作为全球公共事务共同治理者的主体地位,致力于构筑多元协同的网络治理体系,尤其为提高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的话语权和全球治理参与度提供了实践路径,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第四,内容重构:系统化提供全球公共品。从历史发展看,霸权国及其盟友偏好提供制度型全球公共品,将制度作为其维持国际秩序主导权、塑造规则体系和实现长期战略利益的核心手段。在竞争模式中,全球公共品丰富多样,既有交叉重叠的内容,也有相互冲突的内容,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四大全球倡议在功能上有别,但各功能相互支撑,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不仅如此,四大全球倡议同时向全球贡献了理念型、制度型、器物型、赋能型全球公共品,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安全提供稳定的内外环境,文明涵养价值与信任,治理明确方向与规则,四者相互依存、融合贯通,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遵循同一价值主张,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反对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界制定小圈子规则、反对单边主义、反对本国利益至上和资本优先。不仅如此,四大全球倡议以行动为导向,中国积极参与现有多边机制,并且搭建“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个新型多边平台,供给全球制度型公共品,以及提供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疫苗、应急物资、技术装备等器物型全球公共品。理论与实践、理念与行动的融合使四大全球倡议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截至2025年年底,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实施了1800多个合作项目(李强,2025);全球安全倡议在中国成功斡旋沙伊和解等实践中展现了现实可行性。

第五,路径重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四大全球倡议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与接纳的重要原因。这一理念内嵌于四大全球倡议的框架之中,契合国际秩序民主化转型的时代诉求,是对霸权模式中自上而下供给全球公共品、竞争模式中全球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乏统一协同的超越。“以人民为中心”实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是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机制和平台设立真正实现人民主权。其一,在文明交流互鉴维度,《全球文明倡议》秉持世界文明平等共生的核心主张,倡导各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与对话协作,破除文明隔阂与认知偏见,构筑多元文明和谐共处的实践根基。其二,在发展红利共享维度,倡议回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弱势国家和地区群体的发展诉求,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医疗可及性等民生关键领域,践行“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夯实

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基础。其三,在安全权益保障维度,《全球安全倡议》确立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明确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均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的零和博弈逻辑。其四,在治理权力配置维度,《全球治理倡议》锚定“以人为本”的治理内核,明确各国人民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参与主体与终极受益主体的双重地位,推动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向均衡普惠方向转型。其五,在话语权保障维度,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在 多边主义框架下构建涵盖高峰论坛、部长级会议及各专业领域论坛的多层次对话协商机制,为各国人民的诉求表达与意见交互提供充分的渠道,夯实全球治理的民意基础、合法性根基。四大全球倡议以“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引领,系统激活了各国人民参与全球事务的主体效能,为各国人民平等参与文明对话、发展实践、安全治理等全球议题搭建了多元平台,强化了全球治理的民意根基与合法性。

可以看到,四大全球倡议所倡导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是一种“共生”模式。霸权模式和竞争模式均预设人类利益的差异与冲突,对合作的倡导也始终基于利益差异性,而四大全球倡议则坚持“求同存异”,是积极维护全球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张鹭和李桂花,2020)。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计私利,引领国际秩序重构,通过全球文明观凝聚集体行动共识,通过全球发展观提高集体行动收益,通过全球治理观、安全观降低不确定性和集体行动成本,克服竞争性供给模式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低效竞争弊端,为高度异质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持续稳定、彰显正义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新模式,进而引领国际秩序的深层次改革与重构。唯有如此,国际秩序才有可能逃脱霸权国更替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陷入零和博弈困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2022)。四大全球倡议正是要打破这种格局,通过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见表 2),重塑全球对人类社会“共生”状态的底层认知。

表 2 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比较

	霸权模式	竞争模式	共生模式
供给理念	霸权稳定	权力多元化	实现全人类长远利益
供给目的	实现霸权国利益	多元目的,各种利益交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供给主体	霸权国及其同盟	多元主体,缺乏发挥统一协调作用的主体	多元主体,存在发挥统一协调作用的主体
供给内容	价值型、制度型公共品为主	各类公共品	各类公共品
供给路径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存	立足人类共同需求,多元主体协同供给

四、四大全球倡议与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未来

四大全球倡议建立在长期实践基础之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获得了多个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响应。然而,中国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积极姿态,却被一些国家污蔑为霸权竞争,甚至成为美国及其霸权集团遏制和打压的借口。更有个别西方学者质疑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行为,认为这会威胁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能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分裂而非融合(Womack, 2014)。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引领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变革的作用,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四大全球倡议实施进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基于既有成功实践,中国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优化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方法论,持续推进全球公共品模式更新。

首先,面向未来进行增量改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阶段性变化,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主要是被动调适,2001年至今,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拓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公共品的重要供给者,对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当前的全球公共品供给仍然处于霸权模式向竞争模式过渡的状态,共生模式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霸权国的衰退是一个反复较量和多轮博弈的复杂过程,这会增加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成本。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四大全球倡议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进程中,应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供给责任,规避透支国家实力的风险。因此,中国在全球博弈策略中应将自身定位为现有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以面向未来的思维开展增量改革。具体而言,一是要维护和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推动其进行合理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更好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丁洋格和韩秋红, 2025);二是要创设和发展新型多边合作平台,加强跨国项目合作,增加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运行证明了中国在供给全球公共品方面的创新力和强大执行力,金砖国家扩员、上海合作组织等也是中国重构全球公共品模式的重要成果,四大全球倡议需巩固和拓展此类成果,同时避免多边合作平台的重复建设与虚化。

其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确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共商共建共享也是四大全球倡议的基本原则之一,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是进一步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必然要求。共商共建共享倡导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各国都应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习近平, 2017)。在全球公共品提供中,世界各国理应承担起共同责任。中国是四大全球倡议的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但绝非唯一责任人,亟需构建起面向各类国家的参与机制,明确“面向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反对在

主体资格上划分等级和阵营”的原则,保障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制度模式国家的平等参与权。具体而言,“共商”强调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化导向,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议题讨论与议程设置中均享有平等话语权,打破传统全球公共品供给中少数国家主导的话语权垄断格局;“共建”强调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协同逻辑,主张各国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形成多元协同的网络治理体系;“共享”强调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普惠性价值目标,主张公共品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推动构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再次,积极推动倡议落地生根。四大全球倡议始终重视行动导向,已在平台建设、项目实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效,吸引了众多国家共商共建。未来发展需进一步加强执行力,使其落地生根,在有效行动中提高影响力、合法性和权威性。一是要善用多元平台发声,扩大理念型全球公共品的影响力。比如在联合国大会、G20 峰会等重要多边场合阐释倡议内涵,在国外主流媒体上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优秀示范案例。二是要借助重要多边机制,增强制度型全球公共品的适配性。比如推动四大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等全球议程对接。三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器物型全球公共品的可及性,从而获得全球更多国家的认同、支持和参与。比如有效开展 2000 个“小而美”民生项目,举办世界文明对话大会等。

最后,重视新技术的支撑作用。新兴技术是四大全球倡议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重要支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逻辑表明,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新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拓展了更多造福人类的新空间和新场景,进而赋能四大全球倡议的实施,使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更为可行,未来应高度重视新技术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支撑作用。首先,数字技术是助力四大全球倡议落地的关键引擎,能够显著降低发展中国家共享人类文明成果、追赶先进国家的综合成本。比如在发展领域,通过协助发展中国家建设 5G 基站、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务实举措,推动数字技术与当地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数字减贫”,契合全球发展倡议促进共同发展的核心要求;在治理领域,需要探索“数字多边主义”实践,推动跨境数据流动安全规则制定、全球数字治理机制完善。其次,绿色技术为全球公共品的可持续供给提供技术保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绿色发展赋能,使其摒弃“先破坏后修复”发展模式成为可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技术合作、生态保护协同行动等,既可助力构建全球低碳循环体系,又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再次,生物技术创新应用可助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提升传染病防控、粮食安全保障等领域协作效能。最后,空间技术发展为全球资源勘探、灾害监测预警等提供精准服务,强化各国发展与安全领域协同应对能力。各类新技术协同赋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支撑体系,为四大全球倡议有效落实提供坚实保障,助力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综上所述,全球公共品供给机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建立完善一种理念先进、目标明确、主体多元、内容齐备、路径清晰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既是破解全球发

展、安全、文明和治理赤字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全人类共同福祉和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四大全球倡议有效回应了全球治理赤字,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在多维度重构中推动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从“霸权”和“竞争”模式转向“共生”模式,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贡献了中国方案。未来,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共生”模式将在四大全球倡议的持续实践中日臻完善,在实现“全球之治”中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蔡昉. 2017. 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0): 4-22.
- Cai F. 2017. Kindleberger trap or easterly tragedy?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their provisions, and China solution[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0): 4-22. (in Chinese)
- 曹德军. 2019. 论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模式[J]. 战略决策研究, 10(3): 3-29, 99.
- Cao D J. 2019. An analysis of China's global public goods delivery pattern[J].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10(3): 3-29, 99. (in Chinese)
- 程永林, 黄亮雄. 2018. 霸权衰退、公共品供给与全球经济治理[J]. 世界经济与政治, (5): 131-148, 159-160.
- Cheng Y L, Huang L X. 2018. Decline of hegemony,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5): 131-148, 159-160. (in Chinese)
- 丑则静. 2026. 四大全球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J]. 《岭南学刊》(2): 37-49.
- Chou Z J. 2026.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Path in Global Governance[J]. *Lingnan Journal*, (2): 37-49. (in Chinese)
- 丁洋格, 韩秋红. 2025. 全球治理的范式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四大全球倡议”的理念重构与实践路径[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6): 145-158.
- Ding Y G, Han Q H. 2025. Paradigm innov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the pathway to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J]. *Journal of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 (6): 145-158. (in Chinese)
- 樊勇明. 2010. 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 143-152, 158.
- Fan Y M. 2010. From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to regional public goods: a new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ory[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 143-152, 158. (in Chinese)
- 郭锐, 马银. 2025. 全球治理倡议: 逻辑缘起、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J]. 学术探索, (11): 1-12.

- Guo R, Ma Y. 2025.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logical origi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J]. *Academic Exploration*, (11): 1-12. (in Chinese)
- 李强. 2025-09-25(03). 在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 李巍, 罗仪馥. 2019. 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4): 28-57, 155-156.
- Li W, Luo Y F. 2019. From rules to order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 28-57, 155-156. (in Chinese)
- 石静霞. 2021.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 156-179, 207-208.
- Shi J X. 202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156-179, 207-208. (in Chinese)
- 唐世平. 2019. 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J]. 中国社会科学, (3): 187-203, 208.
- Tang S P. 2019.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hina's choice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187-203, 208. (in Chinese)
- 王明国. 2024. “全球南方”与国际制度变革[J]. 国外理论动态, (4): 120-130.
- Wang M G. 2024. The global south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4): 120-130. (in Chinese)
- 习近平. 20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习近平. 20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习近平. 202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徐秀丽, 李小云. 2022. 全球公共品体系转型的三个关键问题[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6): 84-90.
- Xu X L, Li X Y. 2022. Three key issu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public goods system[J]. *Frontiers*, (16): 84-90. (in Chinese)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2013.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Wallerstein I. 2013.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1[M]. Guo F, Liu X C, Zhang W G,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trans. into Chinese)
- 约翰·伊肯伯里. 2008. 大战胜利之后: 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15-236.
- Ikenberry J. 2008.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M]. Men H H,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15-236. (trans. into Chinese)
- 张春. 2014.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J]. 当代亚太, (6): 52-72, 157.
- Zhang C. 2014. Competition over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paths

- forward: polarizing dynamic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6): 52-72, 157. (in Chinese)
- 张翠萍, 吕永红. 2026. 全球治理倡议的历史轨迹、理论架构与现实指向[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7(2): 14-22.
- Zhang C P, Lv Y H. 2026. Historical trajec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J].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7(2): 14-22. (in Chinese)
- 张泽宇, 何玲玲. (2026-01-28)[2026-04-17]. “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实现全球空间正义: 出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OL]. 学术探索. <https://link.cnki.net/urlid/53.1148.C.20260127.1108.004>.
- Zhang Z Y, He L L. (2026-01-28)[2026-04-17].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global spatial justice: emergence logic,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J/OL]. *Academic Exploration*. <https://link.cnki.net/urlid/53.1148.C.20260127.1108.004>. (in Chinese)
- 张鹭, 李桂花. 2020.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J]. 社会主义研究, (1): 103-110.
- Zhang Z, Li G H. 2020. Challe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election of Chinese approa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J]. *Socialism Studies*, (1): 103-110. (in Chinese)
- 周桂银. 2024.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J]. 国际政治研究, 45(1): 83-113.
- Zhou G Y. 2024.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order[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5(1): 83-113. (in Chinese)
- Bunde T, Eisentraut S. 2026. Under destruction: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6[R]. Munic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2024. Global peace index 2024: measuring peace in a complex world[R]. Sydney: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 Kaul I, Grunberg I, Stern M, et al. 1999.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14.
- Kaul I, Conceição P, Goulven K L, et al. 2003. How to improve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M]//Kaul I, Conceição P, Goulven K L, et al.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 United Nations. 2025. Forging pathway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ion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2: uncertain times, unsettled lives: shaping our future in a transforming world[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Womack B. 2014. 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 order[J]. *Pacific Affairs*, 87(2): 265-284.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China's Solution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Model

YU Jianxing^{1,2} QIU Yi³ ZHOU Jun⁴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State System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4. Yingxian School of Philanthropy,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dvanced by China represent not only significant public goods contribu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a distinctive Chinese approach to restructuring the provision architecture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ese Initiatives ste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ward greater equity and rationality. In addressing the persistent dilemma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upply deficit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re strategically anchored in the cor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y establish a coherent analytic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four sequential pillars: value advocacy, agenda setting, experience shar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is framework facilitates a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in the suppl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from traditional hegemonic and competitive modalities toward a symbiotic model grounded in 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 The paper delineates this transformation across four dimensions: underlying philosophy, strategic objectives, substantiv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o further actualize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amplify China's catalytic role in this systemic evolut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forward-looking agenda.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pursuing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at accommodate the realities of a multipolar order, steadfastl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ensuring the concrete operationalization and local embeddedness of the Initiatives, and strategically leverag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s enabling mechanisms. This new paradigm of glob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contributes to overcoming persistent difficulties in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to constructing a more resilient and equitable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system.

Keywords: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global public goods; symbiotic model; China's solution

投稿时间: 2026/2/26 初审通过: 2026/2/26 一审完成: 2026/3/23 二审完成: 2026/4/17